

New

新 | 编

实用英汉  
翻译教程

*A New Practical Textbook for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张煜 康宁 段晓茜 编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 新编实用英汉翻译教程

张煜 康宁 段晓茜 编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 内 容 提 要

本书在讲解传统翻译理论及翻译技巧的基础上,将语篇翻译意识有机地纳入到培养翻译能力的整体训练中,培养学生对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全面认识。本书结合社会的需求,着重选取了实用性较强的专题语篇,如旅游、广告、新闻、科技、外贸、政经时事等,体现出实务翻译的特色,详细讲解其中的翻译要领,并辟专章探索了网络环境下翻译能力提高的途径。

本书内容新颖、练习多样,可操作性较强,便于学生自学,适合用作普通高校英语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教材、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的选修教材及研究生的辅助教材,也适合广大翻译爱好者阅读参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实用英汉翻译教程 / 张煜,康宁,段晓茜编著.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608-7467-8

I. ①新… II. ①张… ②康… ③段… III. ①英语—翻译—教材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0149 号

---

---

## 新编实用英汉翻译教程

张煜 康宁 段晓茜 编著

责任编辑 张智中 责任校对 徐逢乔 封面设计 钱如潺

---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http://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同济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318000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7467-8

---

定 价 38.00 元

---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翻译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语言沟通活动,是推进与传播人类文化与文明的重要手段和渠道。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没有翻译就没有当今人类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如果不重视翻译,不重视各种合格翻译人才的培养,很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生存、发展,更难在文化多元的大格局中对外宣传、彰显本民族的传统精华<sup>[1]</sup>。高等院校的外语系(院)都开设翻译课程,有条件的甚至设立了翻译系或翻译专业,这是顺应了时代和社会的要求。高等院校是我国翻译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因此翻译教学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翻译人才质量的优劣。

## 一、翻译教学的核心任务是培养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

我们认为翻译教学的核心任务是培养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有关翻译能力国内外学者早有论述。Chesterman<sup>[2]</sup>认为翻译能力包括:①对特定文本或词语生成一系列可能译文的能力;②“迅速、肯定地”从这一系列可能的译文中选择一种最适合最贴近的译文的能力。

然而这种对翻译能力的界定比较含糊笼统,不利于翻译教学。事实上,翻译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按照我国学者姜秋霞<sup>[3]</sup>的观点,翻译能力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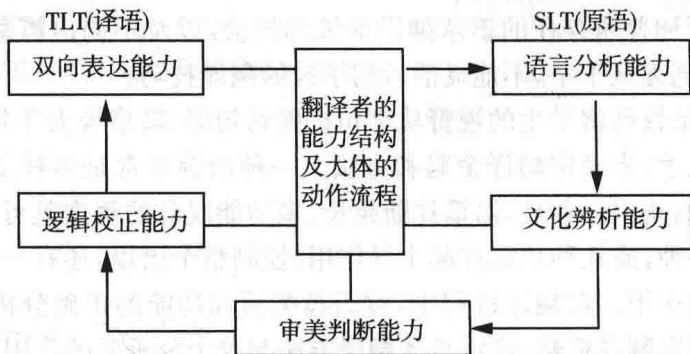
(1)语言能力。即双语语言知识,具体表现为文本知识、文本认知能力、文本生成能力以及言语交际能力等。

(2)文化能力。主要指译者的文化知识结构,即对两种语言民族所特有的惯常信仰、社会礼仪、道德法律、生活风俗、宗教观点、艺术思想等各种知识的内化结构。

(3)审美能力。具体而言,译者除了具有以上语言、文化能力因素外,还需在文本转换过程中具有形象感知、意向整合、想象发挥等各种审美心理。此外,由于英汉两个民族的审美心理不同,译者还应洞悉其中的差异。

(4)转换能力。即在特定语言活动中激活双语语言文化结构,使两种不同的语言形式在各个内容层面上实现有效的对等转换。转换能力是译者在语言文本转换规律方面的认识与培养,译者需通过对翻译转换规律的认识与不断的实践提高这种能力。

刘宓庆<sup>[4]</sup>把翻译能力分解为五个方面:语言分析和运用能力;文化辨析和表现能力;审美判断和表达能力;双向转换和表达能力;逻辑分析和校正能力。这五方面的关系如下:



以上对翻译能力的界定和区分是非常必要的,它清楚地告诉我们翻译教学的核心任务

就是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英语专业本科翻译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各种文体的翻译实践,运用翻译基础理论,训练学生在词义、语序、语法形式、句子结构、篇章结构、习惯表达方式、修辞手段等方面对比不同语言,掌握翻译的基本技巧,从而培养学生独自从事翻译的能力<sup>[5]</sup>。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遵循创造性和灵活性原则,根据自身专业知识和经验恰当地扩充和引申教学技能内容,重视学生的理解力和创造力,做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有机结合,帮助学生打好扎实的语言基础,提高文化素养,增强实际翻译能力以及信息的交流能力。

## 二、在教学内容方面应加重应用翻译的教学

应用翻译是指一种实用文本的翻译,实用性强,应用范围广,几乎涵盖了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就内容来看,应用翻译囊括了除文学翻译以外的所有作品,涉及对外宣传、社会生活、生产经营等方方面面;就文本体裁而言,包括政府文件、告示、科技论文、新闻报道、科普读物、旅游指南、商贸信函、产品说明书、使用手册等各类文本。

传统的翻译教学中,文学翻译占的比重往往偏多。与应用翻译相比,文学翻译具有无与伦比的独特性,如王佐良先生指出,它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且各种文体和表现手段齐全,是语言的灵魂。因此对文学语篇翻译训练的加强,无疑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审美能力,提高其翻译基本功。然而,在当今社会,本科生毕业后,翻译散文、小说的概率显然要比翻译一份企业外宣资料的概率小得多;并且,按照“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的要求,高校英语专业培养的是“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工作的复合型人才”,所以翻译课的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培养纯文学的翻译家。加重应用翻译的教学比例符合“教学大纲”规定的培养目标的要求,同时也符合 21 世纪国家和社会对外语人才的要求,是顺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可见,翻译教学必须与市场要求接轨,教师要不断运用新思维、新理论、新观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变通能力。在重视培养他们全译能力的同时,还要训练其变译能力,如编译、摘译、译述等。我们还可以适当采用开放式教学思路,如鼓励学生参与一定的社会翻译工作。

## 三、在教学实施方面宜采用语篇翻译教学法

传统的翻译教学中,教师往往利用句子作为译例来讲解某种翻译技巧或理论,致使学生在早期学习中认为翻译不过是一种语言练习,从而忽视了翻译的目的是传达整体信息,有效地交流思想。另外,教师课堂上用的句子多数脱离语境,而学生在实际翻译中面对的是受语境制约的篇章,从而造成了教学与实际情况的脱节。通过词句讲解翻译技巧的另一个弊端是,学生无法获得更加普遍存在的篇章翻译训练的机会,以及不同语篇翻译的理论依据,遇到具体文章时仍感到无从下手,不能灵活运用学过的翻译技巧。

语篇翻译教学是教师将学生的视野从字句扩展到句群、篇章等大于句的单位,从分析语篇类型、交际功能入手,来确定翻译策略和方法。一种语篇常常是多种交际功能的集合体,这是许多语言学家的共识。并且,语篇片断越长,多功能混合的程度就可能越大。在多功能的语篇中,总是有一种,或几种功能在起主导作用,控制整个语篇,还有一些功能只体现在局部片段,只起着辅助作用。在翻译过程中,对语篇类型和功能正确分析和判断,认定其交际意图,对于我们制定翻译策略,确定具体翻译方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sup>[6]</sup>。

在课堂讲授中,教师应努力培养学生的语篇意识,增强其宏观逻辑思维能力,直接从语篇翻译入手,对篇章中遇到的相关翻译技巧和理论进行有针对性、有的放矢的讲评和介绍,

所用的译例源自相应的语篇,典型生动,能够准确地揭示某种翻译规律、技能和原则。同时,语篇翻译教学还可以使学生从整体上关注译文的语篇连贯,语义衔接,逻辑连贯。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在编写本教程时,继承了传统翻译教材优势,希冀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

(1)密切联系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使学生的课上所学能在其日后的工作中得到充分利用。

(2)借助最新翻译学理论,并使之与翻译实践相结合。

(3)翻译技巧讲解精透,侧重语篇分析及语篇翻译教学,使学生在掌握翻译基本技巧和理论的基础上,熟悉常见语篇的特征和翻译策略。

本书由张煜统稿,具体分工如下:张煜编写第二章的第三节,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的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第八节,附录二,附录三;康宁编写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及第二节,第七章的第二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附录一;段晓茜编写第二章的第四节。

本教程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青岛科技大学教务处及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鼎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同时,我们参考了国内外近年出版的许多有关著作和刊物,从中选取了一些练习和例句,有的出处列举在书后的参考书目中,有的因种种原因而未能一一列出,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笔者水平与经验有限,且时间仓促,书中肯定存在缺陷和错误,恳请使用本书的师生批评指正。

编著者谨识

2017年夏于青岛

注:

[1]何刚强. 译学无疆 译才不器[J]. 上海翻译,2006(2):39.

[2] Chesterman A. Memes of Translation[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7:119.

[3]姜秋霞,权晓辉. 翻译能力与翻译行为关系的理论假设[J]. 中国翻译,2002(6):12.

[4]刘宓庆. 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34.

[5]穆雷. 中国翻译教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30.

[6]李运兴. 语篇翻译引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45.

#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翻译概述 .....	1
第一节 我国翻译史及翻译理论简介 .....	1
第二节 西方翻译理论及代表人物 .....	4
第二章 翻译的基本理论 .....	7
第一节 翻译的定义、性质 .....	7
第二节 翻译的原则和程序 .....	7
第三节 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 .....	11
第四节 翻译与知识面 .....	16
第三章 英汉语言对比 .....	21
第一节 英汉词义对比 .....	21
第二节 英汉语序对比 .....	25
第三节 英汉主语省略现象对比 .....	31
第四节 英汉衔接及连贯手段对比 .....	34
第四章 翻译技巧 .....	38
第一节 词类转换法 .....	38
第二节 重复法 .....	42
第三节 正反、反正翻译法 .....	45
第四节 抽象与具体互译法 .....	51
第五节 抽词拆译法 .....	54
第六节 增词法与省略法 .....	56
第七节 物称主语与人称主语转换法 .....	62
第八节 形合与意合 .....	67
第九节 视点转换 .....	70
第十节 so... that 句式的译法 .....	73
第十一节 when 句式的译法 .....	77
第十二节 修辞性词语的译法 .....	81
第十三节 被动语态的译法 .....	86
第五章 定语从句的翻译 .....	92
第六章 长句的译法 .....	102
第一节 顺序法 .....	102

第二节	分译法 .....	104
第三节	逆序法 .....	106
第四节	综合法 .....	107
<b>第七章</b>	<b>网络环境下,提高英汉翻译能力的途径和方法 .....</b>	<b>110</b>
第一节	网络环境及网络环境下翻译能力的界定 .....	110
第二节	网络环境下,翻译能力的培养 .....	113
第三节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做好各种文体的英汉翻译 .....	117
<b>第八章</b>	<b>常见语篇类型的翻译 .....</b>	<b>122</b>
第一节	文学类语篇翻译 .....	122
第二节	公文类语篇的翻译 .....	138
第三节	科技类语篇的翻译 .....	143
第四节	国际经贸合同及信函的翻译 .....	149
第五节	旅游类语篇的翻译 .....	158
第六节	法律类语篇的翻译 .....	163
第七节	新闻类语篇的翻译 .....	167
第八节	广告类语篇翻译 .....	171
<b>附录一</b>	<b>英语专业八级考试英译汉试题解析 .....</b>	<b>176</b>
<b>附录二</b>	<b>著名翻译理论家论翻译 .....</b>	<b>182</b>
<b>附录三</b>	<b>汉英标点符号 .....</b>	<b>190</b>
<b>参考文献</b>	.....	194





## 第一章 翻译概述

### 第一节 我国翻译史及翻译理论简介

#### 一、我国翻译史简介

我国的翻译实践活动,大致始于东汉后期的佛经翻译,至今已有近 2000 年的历史了。翻译理论的发展与翻译实践活动相伴而生。本书首先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活动进行梳理,然后探讨我国的翻译理论在不同时期的发展。

以时间为线,我国的翻译实践活动可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东汉到唐宋。这一时期主要是以佛经翻译为主。佛教创立于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前 5 世纪的古印度,两汉时期开始不断向中国传入。佛教一经传入,便被统治阶级用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并逐步取得了合法地位。佛教徒为了宣扬其宗教教义,必然要输入印度的佛教经典,于是便开始了佛经的翻译活动。我国最早的佛经翻译,确凿可考的当是东汉桓帝时期,安世高翻译的《明度五十校计经》,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期开始衰退。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师”: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鸠摩罗什(344—413)是后秦时僧人,祖籍天竺(今印度),生于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约 401 年到达长安开始译经。据史料记载,罗什所译经论达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现存只有三十九部,三百一十三卷。他通过近四百卷佛教典籍的传译,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本来面目介绍过来,对六朝时中国佛学的繁荣以及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印度佛教学者真谛(499—569)南北朝时应梁武帝之邀来到中国。他以严谨的作风和优美的文笔翻译佛教经文四十九部,现存三十六部。真谛所传,主要是大乘瑜伽行学派,其所译《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颇大。隋唐时期是我国翻译事业尤其是佛经翻译高度发达的时期。参与译经的人数和所译经文的数量及译经的质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众多的译家中,唐朝僧人玄奘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位。玄奘(600—664)于贞观三年(629),从长安出发,西出敦煌,四年后辗转到达印度,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前后历经十七年,行程五万里,带回梵文佛经经典六百五十多部。回国后,他亲自主持译场,利用十九年的时间,译出经文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译经质量到达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玄奘对翻译工作的组织和翻译人才的培养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唐代另外一位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是不空(705—774)。不空本是印度人,幼年随叔父来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从海路出发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印度,搜得密藏及诸经论梵本共五百部,于天宝五年(746)回长安,开始译经,据记载共译出密教经典一百一十部,一百四十三卷。唐代末年,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落。北宋初期虽然也有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有高僧东来传教,但佛经翻译情况远不如唐代的极盛时期。及至南宋、元、明,佛经译品寥寥无几。

我国翻译活动的第二个时期是指明末清初西方科技著作的汉译和中国典籍的西译,大体历时二百年。这二百年间,不仅在中国翻译史上形成了继佛经翻译后的第二次高潮,而且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形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高潮。西方科技著作的汉译和中国典籍的西译

是由这一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在当时的中国皇帝和士大夫的协助与合作下完成的。然而,我们必须认清的是,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东来的目的是传教,文化交流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种手段。这一时期翻译的科学著作有一百二十种左右,类别涵盖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技术工程学、军事技术、生理学、医学、生物学、地理学等。比较著名的有明末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与当朝的爱国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合译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明末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1591—1666)编译的《西洋新法历书》;由瑞士人邓玉涵口授,明末的王徵笔录的《奇器图说》等。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还把中国的经籍和文学作品译成外文,为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比较著名的有葡萄牙人郭纳爵和意大利人殷铎泽以拉丁语合译的《大学》;比利时人卫方济以拉丁文译的《四书》《孝经》和《幼学》;法国传教士雷孝思以拉丁文译《易经》等。在文学作品方面的翻译,著名的有马若瑟译的元代杂剧《赵氏孤儿》。

我国翻译实践活动的第三个高潮时期发生在鸦片战争至“五四”前后。这期间,西方的政治、哲学和文学作品大量地译介到中国。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曾设立译馆,编译过《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他也因此成为19世纪40年代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崩溃之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开创了向西方学习进步技术的风气。甲午战争前,官方的洋务机构纷纷组织译员翻译有关西方各国先进技术、思想等方面的书籍,如同文馆首任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有《万国公法》(*Wheaton's International Law*)、《格物入门》(*Natural Philosophy*)等书。甲午战争后的西学翻译以维新派的翻译活动为代表。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局;其他维新派代表人物也在各地成立翻译机构,翻译或编译了大量的西方政治、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维新派人士中最著名的翻译家当属严复和梁启超。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人,字又陵,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其所译作品多为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T. H.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A. 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等。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是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政治家、思想家,又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译作虽不多,但在翻译评论和翻译史的研究方面,却作出了重大贡献。1896年,他把此前二十余年间译出的西书三百多种,汇编成《西学书目表》,在翻译研究方面,写过《论译书》《翻译文学与佛典》等重要文章。晚清时期,外国文学的翻译也极其盛行。翻译外国小说最多的译家莫过于林纾。林纾(1852—1924),福建闽县人,字琴南。他自己不懂外文,但在近三十年的时间与他人合作,翻译介绍了英国、美国、法国、俄国、日本、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希腊等国183部小说,比较有名的译作包括: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美国作家斯土适(H. B. Stowe)的《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英国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孝女耐儿传》(*Old Curiosity Shop*)、《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王子复仇记》(*Hamlet*)等。

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的几十年,我国的翻译实践活动又呈现出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家往往也是翻译名家,如茅盾、鲁迅、瞿秋白、林语堂等。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几年,我国的翻译活动主要集中于对马列著作的汉译及《毛泽东选集》的外译,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为我国翻译事业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翻译活动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大量西方学术著作、科学技术、艺术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帮助中国人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同时,中国的许多文学作品及许多含有深厚中国文化内涵的书籍和资料,翻译成各国文字,让世界人民更多更好地了解了中国。

翻译活动在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 二、我国译学理论的沿革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密切相关。翻译实践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随之产生相应的翻译理论。在我国,译学理论的发展,基本上与翻译实践的发展史相对应。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历史上的翻译理论,还远远没有形成完备的体系和科学的架构。

在以佛经翻译为主的东汉到唐宋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包括道安的“五失本”和玄奘的“五不翻”。道安(314—385)是东晋前秦时代的高僧,在当时主持佛经事业的翻译。他所提出的“五失本”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①经文作为外语,其词序在汉人看来是颠倒的,翻译时应改从汉译语法;②经文文风质朴,而汉人讲究文采,因此译文也应作一定的修饰;③经文的论述往往不厌其烦,反复再三,翻译时应删简;④经文在长文之后另有偈颂复述,称为“义说”,内容重复,译时应删掉;⑤经文中讲完一事,告一段落,要转说其他话题时,又将前话重提,然后再往下说,这些话也应删除。玄奘在其佛经翻译的实践中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另外又有“五不翻”之说。“不翻”就是用音译来翻,他具体提出五种情况用音译,即神秘语、多义词、汉语中没有的物名、久已通用的音译名,以及在为宣扬佛教的场合。

我国翻译活动的第二个时期,即明末清初西方科技著作的汉译和中国典籍的西译时期,徐光启、王徵等人就翻译的目的、功能、翻译工作的迫切性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徐光启认为,翻译工作就是虚心吸取别国的长处,将别国多年积累的科技成果以最快的速度为我所用,以此超越前人。另外他还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翻译思想,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学习和掌握),只有“会通”了才能“超胜”(超越与胜出)。王徵提出了翻译资用思想,他将西方语言、科技、哲理三类书籍,分别称之为“资耳目”“资手足”“资心”之书,认为各不可偏废,都应认真翻译。在这一时期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清初魏象乾的翻译评论文章《翻清说》,该文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内部出版的翻译研究单篇专著。魏象乾根据自己汉译满工作中的切身体会,论述了翻译的原则、标准,以及初学者如何入门与提高等问题。他在文章中提出了非常符合现代翻译标准的“正”译说:“夫所谓‘正’者,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而清文精练,适当其可也。”他还提出了初学者如何对照钻研,每日熟读强记等方法。

晚清时期,对译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有马建忠、严复、梁启超等人。马建忠(1845—1900),江苏镇江人,字媚叔,精通英语和法语,并通晓希腊和拉丁古文,著有《马氏文通》,为我国第一部以西方语法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古代汉语的语法著作,对中国语言学史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其对于中国译学的贡献在于他提出的“善译”说。他指出,要达到“善译”,必须要对所涉及的两种语言深入研究,甚至对文字的字源也深入考察;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原文的音调、文句的繁简、文体的变化以及模仿原文的神情与语义。“善译”标准实际上与现代等值理论非常接近。严复对于翻译理论研究的贡献在于他所提出的“信”“达”“雅”三字标准。他提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假令仿此(西文句法)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民国时期,我国的译学理论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翻译家如茅盾、鲁迅、林语堂等人 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茅盾(1896—1981),字雁冰,浙江桐乡人。20世纪20年代初,茅盾明确地指出了文学翻译者的三个条件:“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研究文学的人;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了解新思想的人;翻译文学书的人一定要他就是有些创作天才的人。”茅盾还是中国译论史上最早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去“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译论家,使“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正式引入翻译理论。鲁迅对翻译问题作的一系列论述,在当时整个翻译界影响极大,并在中国译学理论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鲁迅明确提出了“直译”的观点,这种主张是针对“歪译”而说的,而不仅仅相对“意译”而言。他也提出了“硬译”的主张。对于翻译的标准,他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鲁迅还多次论述了“欧化”的问题,认为“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这种“欧化”“洋气”的主张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益智”,与旅行外国相似,必须有“异国情调”;二是为了“输入新的表现法”,以改进中文的文法。他的“直译”“硬译”主张也正是基于此而提出的。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董秋斯在20世纪50年代最早明确地强调了翻译理论的建设问题,并大力提倡开展翻译批评,标志着我国译学史的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在五六十年代,比较典型的翻译观是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

傅雷(1908—1966),字恕安,上海南汇人。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就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其译作在当代翻译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傅雷多次指出中西思维方式、美学情趣方面的异同,强调翻译决不可按字面照搬,而必须保持原作的精神和美感特征。他继承了鲁迅、茅盾等人关于艺术作品翻译须“传神”的观点,又结合自己全面良好的艺术修养,提出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观。

钱钟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字默存,精熟于英、法、拉丁、德、意、西班牙文与学术,是享誉世界的大学者。其关于译学的论述只是其学术成就的小部分而已,却在中国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钱钟书关于译学最重要的论述就是“化境”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7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绝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此后,翻译家许渊冲(zhōng)提出“三美”说,即“意美、音美、形美”,刘重德先生提出“信”“达”“切”的翻译原则,即信于内容,达如其分,切合原文风格。

可见,我国翻译理论的探讨经历了两千年的发展,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翻译学科的建立将指日可待。

## 第二节 西方翻译理论及代表人物

回顾西方2000多年的翻译研究史,我们会发现两条清晰可辨的翻译研究传统路线:一条是从古代的奥古斯丁延伸到20世纪的结构语言学翻译理论路线,它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认为翻译旨在产生一种与



原文对等的译文,并力求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产生这种语义上的对等。它更多关心的是如何实现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以传达原语中的信息;另一条是从泰伦斯等古代戏剧翻译家一直延伸到现代翻译论家的文艺翻译线,它关注的是如何进行文学文本的翻译,以完成理想意义上的文学文化交流,这条路线上的理论家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学艺术,翻译的重点是进行再创造,他们除了不断讨论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的利弊外,对翻译的目的和效果也进行了分析,他们还强调尊重译语文化,讲究译文的风格和文学性,要求译者具有天赋的文学才华。

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1265—1321)认为:“任何富于音乐和谐感的作品都不可能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破坏其全部优美的和谐感。”但丁这一观点的意义在于,他拉开了西方翻译史上对于文学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漫长争论的序幕。

20世纪是翻译的世纪,翻译的发展和繁荣,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就翻译研究而言,20世纪首先是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得到空前发展的时期。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不仅为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的确立注入了生机。尤金·奈达(Nida)所划分的西方翻译理论四大流派中,除了语文学派的兴趣在于如何翻译经典文献和文学作品外,其余三派均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语言学的理论去阐释翻译中的各种语言现象。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理论的全面确立和发展是在20世纪后半叶。从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著名语言学家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 1869—1982)、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 1914—)、英国语言学家卡特福特(J. C. Catford, 1917—)、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 1916—)等人。

1959年,雅可布逊发表了《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站在符号学的立场上把翻译理解为“两种不同语符中的两个对等信息”重新编码的过程。他把翻译区分为三种类型,即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认为“在语际翻译中,符号与符号之间一般也没有完全的对等关系,只有信息才可用来充分解释外来的符号和信息”。

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翻译观(poststructuralist, postmodernist views of translation),亦称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文学批评理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和保罗·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是其代表人物。在翻译领域,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的《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被看作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奠基文献,在《译者的任务》里,本雅明继承了荷尔德林和洪堡的唯心主义语言观,认为译者的任务就是在翻译过程中把潜在于各种语言中的“纯语言”开发出来,确保语言生命的延续。在“纯语言”里,各种语言的意指方式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翻译给人们指出了通往各种语言相互融合、趋于完满这一至今难以企及的最高境界的途径。他几乎从根本上抛弃了传统翻译理论,将译作比喻原作的“后来的生命”(afterlife),认为原作并无独立不变的本体,必须仰仗译作来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解构主义者试图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改变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认为不是译文依赖于原文,而是原文必须依赖于译文才能延续其生命,作家和作品只有通过翻译才能获得“再生”。

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是描写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翻译更主要的是受历史制约的面向译入语的活动,而不是纯粹的语言转换。因此,他对仅仅依据原文而完全不考虑译入语因素(与原语民族或国家完全不同的诗学理论、语言习惯等)的传统翻译批评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研究者进行翻译分析时,应该注意译入语一方的参数(parameters),如语言、文化、时代等,这样才能搞清楚究竟是哪些因素,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翻译的结果。他还进一步指出,研究者不必为翻译在(以原语为依据的)“等值”和(以目的语为依据的)“接受”这两极之间何去何从而徒费心思。

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了一种文化理论——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其核心内容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他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他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简而言之,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到世界文化、小到国别民族文化的活动图。

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他把翻译与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认为强势国家和弱势国家之间的翻译活动并不是一种平等交流,而是存在着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号召译者采取抵抗式的翻译策略(resistant translation),主张“异化”(foreignization)翻译方法。韦努蒂所谓 domestication 和 foreignization 是针对西方翻译界长达四百多年的所谓流利倾向(flucency tendency)有感而发,主要指从其他语种向英语的翻译。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要想翻译成英语,在英语世界里流传开来,必须用符合英语国家读者所乐于接受的形式与内容,否则就很难站住脚。著名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翻译策略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在研究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欣赏习惯之后,亲自动手把自己的诗歌译成英语,抹掉了不少棱角,消掉了不少锐气。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的做法就是 domestication,该词体现了欧美民族中心主义,体现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侵吞和侵略。因此,韦努蒂号召译者采取抵抗式的翻译策略,主张“异化”翻译方法。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个根本性突破:

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深层探究。

翻译研究突破了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即组织或提议翻译某部作品的个人或群体)、翻译文本的操作者(译者)和接受者(不仅指译文读者,还有整个译语文化的接收环境)身上。

翻译被放到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研究者借用各种当代文化理论去考察、剖析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入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既注意到了翻译与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注意到了它与译入语社会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流派之间的关系。



## 第二章 翻译的基本理论

### 第一节 翻译的定义、性质

关于翻译,古今中外许多翻译家及学者都曾努力给出一个既全面又严密的定义。中国唐朝学者贾公彦在《义疏》中对翻译做了如下界定:“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英国著名学者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 1709-1784)对翻译也作过类似的定义:“To translate is to change into another language, retaining the sense.”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 Newmark)则认为,翻译是按作者的创作意图把一篇文章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描述出来的过程(It is rendering the meaning of a text into another language in the way that the author intended the text)。美国的翻译理论家奈达把翻译定义为:“所谓翻译,是指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在语义上,其次是文体上。”(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我国学者黄龙教授认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目的语)的文本材料对等地再现另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

从以上学者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翻译基本上是一种语际转换活动。然而翻译又非纯粹的语言活动,它还涉及各种非语言因素,特别是社会文化因素。翻译实际是一座连接自身文化和异族文化的桥梁,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思想,相互了解。因此,可以说翻译同时也是信息传递过程,信息的内容不仅包括语义的、文体风格上的,还有思想上、文化上的。世界文明的发展史表明,翻译是人类沟通思想感情、传播文化知识、促进社会进步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

我们可从不同的角度为翻译作以下分类:

1. 从所涉及的语言或符号而言,翻译可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
2. 就活动方式而言,翻译可分为口译、笔译和机译。
3. 按处理方式,翻译可分为全译、节译、摘译、编译等。
4. 按翻译材料的文体,翻译可分为应用文体、科技文体、论述文体、新闻文体和艺术文体等。

### 第二节 翻译的原则和程序

#### 一、翻译的原则

国内外有关翻译的原则(或标准)一直进行着激烈的讨论。如英国著名翻译家泰特勒(Alexander F. Tytler)系统地提出了进行翻译和评判翻译三条基本原则:

1. A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

2.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as that of the original. (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与原作属于同一性质。)

3. A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 (译作应与原作同样流畅。)

又如我国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对我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翻译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提出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在翻译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又有人提出了符号学的翻译原则,即在译语句法和惯用法规范以及具体接受者能够接受的限度之内,采取适当的变通和补偿手段,以保证上下文中最重要意义优先传译为前提,尽可能多地、正确地传递原语信息的多重意义,以争取原文和译文最大限度的等值。

然而,对于翻译初学者来说,首先应把握住翻译的最基本原则:忠实、通顺。

### (一)“忠实”

首先指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一般情况下,译者的任务是把握原作的思想内容,使之完整、准确地传达出来,不能随意加以篡改、曲解、遗漏或增删。原作的思想内容通常指作品中所叙述的事实、说明的道理、描写的景物,以及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反映出的观点立场,所流露出的思想情感。

例1 The key challenge facing any sizeable organization today is how to achieve responsiveness without losing the control inherent in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如今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机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做出快速反应,灵活应对,同时不失去层级制结构特有的控制。

从“忠实”的角度看,该译文有两处有悖于原文内容,一是额外添加“灵活应对”这一原文中并未体现的意思,二是对“control”一词表达不够准确,在此应为“管理、控制能力”,对于英语中的抽象词语翻译时应作具体化,明确化处理。

改译:如今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机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获得快速反应能力的同时,继续保持层级制结构特有的管理能力。

例2 Cooper was illustrating a distinctly American trait, future-mindedness: the ability to see the present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the future; the freedom to feel unencumbered by the past and more emotionally attached to things to come.

库柏揭示了一种美国人独有的特征:他们能够站在未来的高度来看待现在的一切;摆脱过去束缚而更加亲近未来。

不难发现,译文中有一处明显的漏译,即对“future-mindedness”一词的漏译。

改译:库柏揭示了一种美国人独有的特征,即前瞻性:他们能够站在未来的高度来看待现在的一切;摆脱过去束缚而更加亲近未来。

例3 “Maude Louise Squirewell, heh, heh. Boy, you people really have some names, don't you?”

“莫德路·易斯斯·夸尔韦尔,嘿嘿。小伙子,你们这些人真的也有名字吗?”

且不说译文中对“boy”一词的曲解,译文没有充分表现出政府官员说此话时流露出的对黑人的鄙视之情。“boy”在这里是语气词,表示惊讶、愤怒、鄙夷等。

改译:“莫德路·易斯斯·夸尔韦尔,嘿嘿。好家伙,你们这号人竟然也有名有姓,嗯?”

“忠实”原则的另一方面还指保持原作的风格,包括原作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语体风





格及作者本人的语言风格。

例4 If people mean anything at all by the expression of “untimely death”, they must believe that some deaths run on a better schedule than others.

如果有人通过“死得太早”这种说法来意味什么的话,他一定认为有些死亡比另一些在时间上来得更好。

该译文基本达意,然而原文属于议论文体,译文语言过于拖沓、累赘,与原文语体风格不符。

改译:说起“早逝”,人们或有所指,他们定然相信有些死亡更合天意。

例5 They were seated in the boat, Nick in the stern, his father rowing. The sun was coming up over the hills. A bass jumped, making a circle in the water. Nick trailed his hand in the water. It felt warm in the sharp chill of the morning.

这段文字选自海明威的《印第安寨子》。海明威的写作风格简洁、含蓄、自然,翻译时应尽力保持这种萧散简远、意在言外的风格。

译文:他们已经坐在小船里了:尼克在船尾,父亲摇着桨。太阳爬上小山。一条鲈鱼跳起来,水面泛起圈圈涟漪。尼克把手伸到水里,水流流过手掌,在清晨凛冽的寒气里,湖水感觉很暖和。

## (二)通顺

即指译文语言表达顺畅易懂,符合目的语言的规范,“力求其易解”。读起来没有佶屈聱牙、晦涩难懂、不知所云之感。

例6 Writers cannot bear the fact that poet John Keats died at 26, and only half playfully judge their own lives as failures when they pass that year.

作家们无法忍受这一事实:约翰·济慈二十六岁时就死了,于是就几乎半开玩笑地评判他们自己的一生是个失败,这时,他们才刚刚过了这一年。

显然,译者没有考虑到英汉句法的差别,亦步亦趋仿照原文,使得译文拖泥带水,让人感觉语无伦次,从而影响了意思的正确传达。

改译:诗人约翰·济慈年仅二十六岁便溘然长逝,作家们对此深感惋惜。在他们过了二十六岁后,便不无戏谑地叹息自己一生无所作为。

例7 On Sunday after the rain there was an April glory and freshness in the valley added to the quiet of the later summer.

在雨后的星期天,田野里出现了一种四月的光荣和新鲜,给这晚夏增添了一丝安静。

改译:在雨后的星期天,除了夏末的恬静,山野里还透露着四月的光辉和新生气息。

在翻译实践中,忠实与通顺两项原则一定要同时兼顾,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割裂;讲忠实时不能妨碍通顺,求通顺时不可影响忠实。

## 二、翻译的一般程序

翻译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译者应遵循一定的程序,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切不可急于求成。翻译工作,一般要经过三个程序或步骤:理解、表达、校对。

### (一)理解

准确理解原文是作好一切翻译的前提,是翻译工作的第一步。要正确理解原文,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